

文化素质教育类

高等师范院校教材

中国文化简论

Z H O N G G U O W E N H U A J I A N L U N

主 编 李 健 孟兆怀 唐健禾

副主编 陈万松 王金星 潘良炽 李康云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简论

总 策 划：陈国弟 张晓舟
责任编辑：张振刚
责任校对：李 敏 朱兰双
封面设计：罗 光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简论 / 李健, 孟兆怀, 唐健禾主编.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8

ISBN 7-5614-2650-X

I. 中… II. ①李…②孟…③唐… III. 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68891号

书 名 中 国 文 化 简 论

主 编 李 健 孟兆怀 唐健禾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610065)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63千字

版 次 200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12501~15500册

定 价 25.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85408408 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www.scupress.com.cn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研究（代序）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时，中国传统文化更显示出无比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她，认识她。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中国文化也走向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热”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

一、文化及相关概念

在中国，“文化”一词渊源颇深。《周易·贲·彖传》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大概就是“文化”一词的来源。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可见，“文”就是“文治”，“化”就是“教化”。“文”与“化”联系起来组合成的新词至迟在西汉晚期已经使用。西汉著名学者刘向在《说苑》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①这段话被认为是“文化”最初而标准的解释。它说明，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文化”是与“武力”相对的概念，本是“以文德加以教化”的意思，包含有文治、教化以及礼乐典章制度等。文化一词的传统含义并不少见，又如晋代束皙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②梁萧统解释

① 《说苑》卷15《指武》，《四库全书》本。

② 《六臣注文选》卷19《补亡诗·由仪》，《四库全书》本。

道：“言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①王融在《曲水诗序》中也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②这与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③的说法完全相同。总之，中国古代固有的“文化”带有传统德治思想或者说封建教化理念。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的内涵大相径庭。如今我们常说的“文化”是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进程而输入的一个舶来概念。它是从拉丁文culture意译而来的。其本义是耕种，引申出修养的涵义。西方中世纪时，文化变成了艺术的总称。而1871年，泰勒在《文化的起源》中提出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和“文化是整个的生活方式”。20世纪以来，关于“文化”的定义越来越多，其涵义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而中国学者也在自觉地进行着新的探索。如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又说：“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狭义二种，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④梁漱溟则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称：“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胡适则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说：“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文化”的涵义在持续数十年的论争中，至今还没有一个学者们一致认可的结论。但是，它是一个烙上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印记的整体却是毫无疑问的。

与“文化”相近的概念还有多个。首先是“文明”。“文明”成词很早，在《周易》中我们可以多处找到。《周易·贲·彖传》：“文明以止，人文也。”王弼注：“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周易·同人·彖传》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这里，“文明”显然与传统的“文化”十分相近，均与“威武”相对而言。但“文明”的意义又不仅限于此，它还具有“文章而光明”的意思。比如《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尚书·舜典》：“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疏：“舜性有深沉智慧，文章明鉴，温和之色，恭逊之容，由名闻远达，信能充实上下。”《礼记·乐记》：“情深而文明”，孔颖达疏：“志起于内，思虑深远，是情深也；言之于外，情由言显，是文明也。”

① 《六臣注文选》卷19《补亡诗·由仪》。

② 《六臣注文选》卷46《三月三十日曲水诗序》。

③ 《论语·季氏》。

④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物的专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历史研究法》导读本附，1998年。

所以，传统“文明”的概念与今天流行的“文明”一词的涵义相去甚远。今天所说的“文明”一词同“文化”一样，也是“西学东渐”的舶来品。它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野蛮民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人用“文明”代指原始社会——比野蛮阶段相对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文明”一词还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示“地域性文明”。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文明热”也在国内外扩展开来。正如对“文化”的解释一样，“文明”的内涵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无定论。而“文明”又常与“文化”混同。钱穆称：“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①

与我们常称的“传统文化”相应的倒是中国人自己的说法。他们表述为“中学”、“旧学”、“国粹”、“国故”、“国学”等。这些词语是在“西学东渐”出现后，为了有别于西洋学术文化而逐渐在文人圈、学术界叫开的，其中也或多或少受到西方一些概念的影响。中国人最早将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称为“中学”，将西方文化称为“西学”，如洋务派著名人物张之洞就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推行，有人又将西洋学术文化称为“新学”，而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称为“旧学”，甚至是“古学”，倡导“古学复兴”，具有“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出于保持中国文化命脉的考量，一些学者又将传统文化称为“国粹”或“国故”。这完全是他们对“西学”浸润不甘屈服的本能反应。从字面意思上看，“国粹”就是国之精粹、精华，而“国故”则是指中国过去的或旧的事物，主要指传统的文化、文献。20世纪初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章太炎著《国故论衡》等皆是。由于“国粹”、“国故”流露出保守恋旧的情绪，又或多或少地带有主观色彩，它们逐渐被更有中性涵义的“国学”取而代之。曹伯韩在20世纪40年代是这样认识“国粹”、“国故”和“国学”的：“国粹两个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这样看，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但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后又简

^① 《中国文化史导论》编首《弁言》，商务印书馆，1994年修订版。

化而称国学。”“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发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包括进去的。”^①钱穆对“国学”的内涵也曾作过简单的说明：“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时贤或主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如章氏《国学概论》讲演之例，实难赅备。”钱氏本人在阐述国学时，则“于每一时代学术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阐发”^②。《国粹学报》的主编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③可见，“国学”有提倡爱惜中国的历史，从而激起爱国热忱的意味。1902年梁启超谋创《国学报》，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又于1922年在上海公开作《国学概论》的讲演，刘师培发起“国学保存会”，胡适主办《国学季刊》等均是国学兴起的表现。20世纪20年代，国学更为盛行，“其时中学校率有‘国学概论’一课”^④。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或合并或停止，近代国学研究持续了半个世纪。

张岱年在1991年3月为《国学丛书》作序称：“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20世纪初年，国内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其后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作了《国学概论》的讲演，于是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⑤在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国学研究》第一卷的基础上，“国学热”再度兴起。而20世纪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从未完全中断过。

“学术”一词也与文化有莫大的关系。梁启超在1911年写过《学与术》的文章，其中辨析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

① 曹伯韩《国学常识》第1章《概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需要指出的是，“国学”的概念是“国家”概念引入中国后才产生的。

② 钱穆《国学概论》编首《弁言》，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③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光绪32年（1906年）6月20日出版。

④ 钱穆《国学概论》编首《再版附识》，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⑤ 《〈国学丛书〉序》，载《国学丛书》编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①学是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而获得的理性认识，而术则是这种理性认识的具体运用。对此，梁启超还有更为简捷的说法，“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②。严复为所译《原富》一书作按语，以知、行关系来解说学与术之间的差别与联系。他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③这种说法其实与梁任公并无实质上的差异。提倡学术，尤其是传统学术，其实正是西学刺激下的产物，又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联，应该说是学者们力图对传统文化总结研究并加以发扬光大，以祛除西学带来的技不如人的羞辱^④。梁启超曾经说过：“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觐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⑤王国维对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情感，并最终为学术自由献出了生命。他对比中西国家之所以立国立世，强调指出：“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也。”^⑥而为王国维写过《海宁王先生之碑铭》，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陈寅恪也说，学术的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⑦。

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的，还有“汉学”一词需要加以说明。与“文化”、“文明”一样，学术界对“汉学”也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说法。有学者认为，凡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都可以称为“汉学”，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与“汉学”也就没有多大差别。但也有学者认为，“汉学”一词毕竟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英文是sinology，法文是sinologie，指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现状、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的研究，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精神和物质文明认

① 《饮冰室文集》之25下《学与术》。

② 《饮冰室文集》之25下《学与术》。

③ 王拭主编《严复集》第4册《〈原富〉按语》第58节，中华书局，1986年。

④ 从林则徐、魏源开始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无不显示着人们对技不如人的认可与不甘现状的扎实努力。其实区别“学”与“术”正是在作这种功夫。

⑤ 《饮冰室文集》之7《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⑥ 《饮冰室文集》之7《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⑦ 蒋天枢编《全明馆丛稿二编》之《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

识的概括，所以“汉学”更多的是指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而中国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是相对地称为“国学”更为合适。张岱年先生在讲述传统学术时，似乎对“汉学”不甚满意。他说：“西方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现在亦译为中国学。在某些西方人的心目中，所谓sinology不过是对中国历史陈迹的研究，把中国学术看作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①

二、古代的文化总结与研究

灿烂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绵延数千年而永葆青春。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学者专家都对它发出无比的赞赏，而介绍、总结、研究者比比皆是。回顾历史，虽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但古代学者对学术文化本身进行研究总结的书籍文献仍不胜枚举。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天下篇》就对当时“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学术状况做出了客观的介绍，而《韩非子·显学篇》也有“儒分为八，墨析为三”的评说，对研究儒学的流传演变提供了第一手素材。荀卿虽出于攻击异己、自树旗帜的需要写作《非十二子》，但其评点诸子，正显示出当时文化百家竞鸣的奇丽景观，正所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②。也正是在此时，孔子、老子、庄子、孟子、韩非子、墨子等人物已富有了时间、空间、精神底蕴等多维内涵，成为中国文化不绝于响的千年回音，成为一种无与伦比的文化象征。

进入汉代，对文化的研究综述勃然兴起。首先是淮南王刘安，他汇聚众学，纂著《淮南鸿烈》，其《要略篇》虽系本书篇目提要，但在篇末却历数了从“太公之谋”到“刘氏之书”（即《淮南鸿烈》）出现的原因，这无疑对学术发展演变的历史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汉武帝时，“军政杨仆摭摭遗逸，纪奏《兵录》”^③，对传统的军事文化进行总结，成为我国文献学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部专科书目。司马谈《六家要旨》独崇道家^④，司马迁则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⑤的豪壮气概，对上下几千年的文化作了全面的梳

① 《〈国学丛书〉序》，《国学丛书》编首。关于“汉学”研究历史，何寅、许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一书可以作为参考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③ 《汉书·艺文志》。

④ 司马谈《六家要旨》所说的“六家”指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其中阴阳家排在儒家之前，而真正称颂备至的是道家。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⑤ 《汉书·司马迁传》。

理阐释。刘向、刘歆父子对传统文献的大型整理，对传统学术的深刻梳理，更是影响千古。《别录》、《七略》的完成，合理而全面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学术。其“学出王官”论于千年之后仍熠熠生辉，受到以章学诚为首的学者文人的无比赞赏。班固继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之后，对当时的传统文化做出了全面的疏释，其成果在《汉书》里得到了全面的展示。《汉书》在《史记》基础上更专题化、系统化地阐释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以至以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人们总是在形式上沿袭，在内容上创新。传统文化的底蕴舍此“正史”而莫由。自汉以后，学术研究与总结纷繁复杂，未可以一端计。

中国传统文化按传统的分类方法，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文化。传统的经学，从广义上讲就是儒学文化，它在发展中不断得到总结。汉宣帝在白虎观主持召开经学会议，裁决五经异同，是以皇权专制的形式总结西汉兴起的今文经学成就。《白虎通义》就是这次总结的结集。郑玄以经学家的身份，遍注群经，融会今古，对两汉今古文经学进行了一次大总结。到了唐代，唐太宗、唐高宗乃至唐玄宗都先后关注各经注疏的总结工作，孔颖达《五经正义》完成之后又出现《周礼注疏》、《仪礼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以及《孝经注疏》。至宋，《十三经注疏》完成。宋代新儒学——理学兴起之后，儒学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对它进行集成总结的也大有人在。其中，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明王守仁集心学之大成。明初，胡广等奉敕编撰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无不带有总结学术文化的性质。至清代，学术活动有增无减。清代官私编撰的学术总结性文献与明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李光地奉敕编写或自编的就有《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其影响颇为深远。清统治者组织完成了十三经的重新疏释工作，而清代私家著述完成的《十三经清人注疏》更是站在古代历史的至高点上，对儒学作了更新的梳理，其成就至今无人能逾越。

在儒学文化中，对儒学的总结还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这就是学者有意识地撰写“渊源录”、“道命录”、“学案”等书籍。他们对儒学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总结工作，具有文化史的内涵。朱熹有《伊洛渊源录》、《近思录》、《宋名臣言行录》，李心传有《道命录》。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万斯同《儒林宗派》、沈佳《明儒言行录》、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等均是。而黄宗羲开创的儒学学案体更在儒家文化的总结上做出了贡献。由他牵头完成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地位卓著，影响深远。此后，江藩《国朝宋学渊源录》、《国朝汉学师承记》、朱彝尊《经义考》、唐鉴《清儒学案小识》、徐世昌

《清儒学案》、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通论》、谢启昆《小学考》无不带有这种色彩。进入20世纪后，用这样的方式总结学术文化的仍不乏其人。章太炎《馥书·清儒》，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子新学案》、《国学概论》等比比皆是。杨向奎先生尚编有《清儒学案新编》。

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长于编纂历史的国度，前人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书典籍。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数千年而不衰竭，与此不无重大关系。历来的史学工作者对史学文化的总结是不言而喻的。前面提及的司马迁可以算作典范。“史家之绝唱”，其实最绝就绝在《史记》对中国数千年的远古历史做出了全面而生动的总结。以后的二十四或二十五部正史尽管以断代为史，但其基本精神却得到了保存，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道学传”等书、志无不体现出学术文化史的内涵。在史籍中，编年体史书同样具有这种特征。与全国性史书相比，地方志在总结文化上也毫不逊色。“通志”、“总志”、“县志”等名目繁多的地方志无疑是了解和研究地域文化的最好资料。

其实，在史部文化中，更能体现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总结的，或许还是由司马迁开创的具有“会通”意识的通史及典制体史书。除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外，典制体“十通”是最受关注的。它们前后相续，对传统文化精华的提炼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它们是《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而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更是讲求学术文化的佼佼者。

目录著作也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梳理的作品，它们，尤其是有序目提要的目录著作完全可以称为文化史的典范著作。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是其中的开山之作，而历代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更以其特殊的地位倍受重视。独立成书的目录书中，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清代纪昀等奉敕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是其中最为杰出者。学习传统文化，目录著作无疑是最好的桥梁。

中国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知识更多地记载于子部著作之中。“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①在古代真还有些缺乏对它们的全面总结。不过，历代对类书编纂的重视或许可聊补其缺。我国类书早在三国魏文帝时已产生，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91《子部总叙》。

曹丕敕撰的《皇览》就是代表。到唐代，类书已大量出现，如《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元和姓纂》、《白氏六帖事类集》等。宋代，《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及《册府元龟》成为官修的三大类书，而私修类书也不乏其人，如王应麟的《玉海》、章如愚的《山堂考索》（即《群书考索》）等都十分出名。明代编纂的《永乐大典》、清代修撰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更是享誉中外。它们或多或少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随着学术文化本身的发展，人们逐渐采用丛书的方式出版结集古籍。从《澹生堂书目》子部立丛书一类后，丛书开始受到了目录学家更多的重视，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确立丛书一类更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与类书相比，丛书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其中，《四库全书》可以算作中国文化的渊薮与典型代表。

集部书籍是中国文学艺术文化的主体。在这座殿堂中，同样有着各式各样的学术总结性作品。总集、选集是较为突出的文化结集之作。试想想《文选》、《唐诗三百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或许其中的疑惑可以迎刃而解。而《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也未尝不是文化的集中凝聚。如果说这些还太泛而无要的话，那么像诗文词曲评的著作无疑更有文化总结与研究的含义。像《诗品》、《文心雕龙》都可以看做代表中国文化面貌的杰作。

佛道二教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古籍分类中，它们被划入了子部之中。佛道文化的结集是较早而又非常突出的，这就是《佛藏》与《道藏》的编纂与结集。

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太深太深，舍此四部文献而莫能窥其万一，而由此剥立出来、独立成编的短小的“文化简论”只不过是她博大胸怀的皮毛而已！

三、近代以来的文化总结与研究

西学东传，中国社会从物质表象到精神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在文化上又深深地刺激了有着传统文化素养的中国学人。在保国保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思想影响下，中国人更多地思考如何有效地拯救民族危亡。面对西洋学术，洋务派领袖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承认西学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念念不忘。清季朝野均有保存中国传统学术的愿望和具体的努力，他们的活动对传统文化的总结发扬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维新运动兴起，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中国学者又将相对于西方新学的中国学术文化称为“旧学”、“古学”。新式学堂日益勃兴，旧学越来越受到

挑战。一些学者出于保存中国文化命脉的考虑，将传统文化（中国学术）称作“国粹”或“国故”，努力加以总结、阐扬。20世纪初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章太炎著《国故论衡》等皆是。稍后，“国学”应运而生，其时在20世纪之初。1902年秋，梁启超在日本谋创《国学报》，曾和黄遵宪函商，黄遵宪甚至建议撰写《国学史》。章太炎《国学概论》的讲演，胡适主办的《国学季刊》均为宣扬、研究传统文化树立了旗帜。而20世纪20至30年代前期，由于新文化运动而名声大噪的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使得国学研究成为时尚，研究活动达到鼎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则分别开设了国学门和国学研究院。不过，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或综合提炼，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①。

在中学向旧学、国粹、国故，再向国学的转变过程中，伴随的是一系列关于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论争。“从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争论开始，到新文化运动时的整理国故，再到北伐前后两次关于国故和国学的大讨论”，“在近三十年间，大体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发展演化进程”^②。这些论争既是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产生的，也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表征，而它们又无不带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探索与分析解读。在艰难的探索历程中，中国学人面对残酷无奈的现实，对传统文化加以反思，得出的是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王国维在其《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指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发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陈寅恪也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③那位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学者胡适无疑是中西结合的杰出代表。他倡导整理国故，甚至认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④。其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则源于美国学者杜威的实验主义。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对中国传统文

① 关于此时期国学研究的情况，可参考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②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编首《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③ 《金明馆丛稿二编》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④ 许啸天编辑《国故学讨论集》上册《论国故学——答毛年子水》，《民国丛书》本。

化破坏的多，建设的少，但他们在清理传统文化上做出了难以匹敌的成就。历史在残酷的20世纪前期却给我们留下了像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多位著名的国学大师。“西学东渐”带来如此丰硕的成果，或许这就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感遇》中所说的历史“悖论”：“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

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化史的著述上。在欧洲，文化史分支学科是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确立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可以算作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而在中国，文化史著作的出现却要晚得多。20世纪初，日本人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化史的专著，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如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写过《支那文明史》，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的艺术和宗教、政治和政体，以及历书和地理、土木建筑、文字书法、绘画、音乐杂剧乐器、舟车及金属使用等的发展历史，作了粗略的描述。可以说，这是最早的中文版的文化史专著。

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步伐，在“国学研究”的旗号下，中国人从20世纪初开始建立起中国文化史学科，并在完全意义上进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与研究。梁启超为中国文化史学科的确立建立了斩荆披棘的褴褛之功。1912年秋，他应聘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印有《中国文化史稿》讲义。1921年，该讲义发表于《改造》杂志，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此书其实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此后，梁启超又曾拟撰写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但最终发表的也只有共8章的《社会组织篇》（1936年）。就是这一篇也不过是旧式的中国通史的背景篇。1923年，梁启超还曾发起创办文化学院，但其目的也并不纯真。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史研究进入了短暂的兴旺期。1924年《史地学报》报导说：“近来研究历史者，日新月异，内容大加刷新，多趋重文化史方面。”^①此时出现了多种文化史专书，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有一定魅力。如顾康伯《中国文化史》（1924年）共分13章，声明要跳出日本同类著作的窠臼，而自立体系。常乃德《中国文化小史》（1928年）分15章，通俗可读，赢得了颇多的读者。杨东莼《本国文化史大纲》（1931年）提出打破王朝体系，把历史分成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智慧生活三部分别叙述，并以历史事实为单元，认为阐明其因果利弊及联系需要从经济角度才能明白解释。柳诒

^① 《史地界消息·历史类（一）〈研究国史方法之倡导〉》，《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

徵的《中国文化史》（1932年）2册，共3编，影响很大，流传颇广。该书的内容曾于1925年在《学衡》杂志上刊载过，内容颇多“国粹”气味。作者对待史料的态度相当严肃，且以学术文化的陈述见长，由于史料丰富，对读者进一步认识传统文化颇有帮助，因而多次再版。陈登原《中国文化史》（1937年）上下2册，卷帙较重，属于以文化为主的通史，在章节安排上相对别致。全书共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4编，编下再分章节。此外，陈国强《物观中国文化》（1931年）力图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文化之演进。王德华《中国文化史略》（1936年）以问题为中心论述文化的演进。陈安仁《中国近世文化史》（1936年）分述宋元明清四朝文化，而其《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1938年）则介绍了先秦至唐代的文化。丁留余《中国文化史问答》（1933年）为“百科常识问答”丛书之一，分3编，分题设问作答。王云五《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1937年）从编纂的角度对中国文化及其史料和编纂做出了分析。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研究陷入了困难境地。在艰难的环境中，中国仍然出版了不少文化史论著，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明显的提高。40年代出版的文化史著作主要有雷海宗《中国文化史中国的兵》（1940年），分上下2编，由7篇独立论文组成；李建文《中国文化史讲话》（1941年），依朝代分为9章，略述了从古代到近代的时代变化及其文化形态；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1942年），分中国经济与中国文化、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3章；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1943年），分10个专题多角度论述了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王治心《中国文化史类编》（1943年），以专题为经，时序为纬分6编论述了文化的定义与起源、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风俗情形、学术思想源流、宗教伦理沿革以及艺术器物发明；陈竺同《中国文化史略》（1948年），分4章分析了史前序幕文化、有史期第一阶段文化形态及余论；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948年），共分10章，撰写于1941年，部分内容曾在杂志上发表。在这些著作中，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利用自然环境长期不变的特性来讨论“文化精神”的不变性，具有复古、排外的成分，但其崇扬传统文化，对树立民族文化自信颇有作用，而且分析深入，受到长期重视，再版重印过多次。陈竺同《中国文化史略》从工具和产业分析文化的进程，在旧中国的诸种文化史论著中别具一格。

王云五主编的大型《中国文化史丛书》是这一时期专题性文化史著作的代表。丛书共分80个专题，每册一专题，于1937年后相继推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其中很多作品的精深程度至今还让学者们叹服不已。

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有些著作从宏观上对中国文化运动做出分析评论，如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1934年）、伍彦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年）、张君迈《明日之中国文化》（1936年）、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1936年）、李麦麦《中国文化问题导言》（1936年）、陈登俤《中国文化问题研究》（1937年）、陈安仁《中国文化问题之探讨》（1945年）、缪风林《中华民族之文化》（1948年）、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问题》（1948年）、姚红旗《民族文化史论》（1949年）、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在这些著作中，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影响较大，学林出版社于1987年重新印刷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研究的环境和条件都有了一定的改善。20世纪50年代，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教学，文化史都受到很大重视。高等院校的通史教学中，文化史同政治史、经济史一道鼎足而立。在通史或断代史著作中，也形成了无文化史不成书的惯例。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前三卷，经学史、艺术史、科学史都占有很大比重。但是，从50年代，尤其是50年代后期起，综合性的文化史研究，或者说文化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朝着与逻辑相反的道路前进，变得越来越冷寂，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基本上陷于中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迎来了新的春天。进入80年代后，“中国文化热”一浪高过一浪，文化史研究蔚为壮观。1982年夏天，中国文化史热重新出现，由《中国文化》顾问周谷城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会座谈会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1983年5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就有关中国文化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问题，分别进行了专门讨论，从而促成了《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的出现。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署名文章《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此文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国学研究》第一卷为基础，报道了北京大学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现状。同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今日谈”栏目中发表署名文章《久违了，“国学”》，赞扬北京大学开展国学研究的见地和气魄，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精神。由此，国学热再度兴起。面对如此新气象，学者们欢呼雀跃。胡道静先生为帮助人们了解国学，继承和开发中国古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选录了20世纪以来国学大师、名家从宏观上论述国学及某一领域之作，编辑成《国学大师论国学》上下2册，由东方出版中心于1998年出版。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专门的学术团体、期刊日渐显现，相关的学术讨论会、文化史讲座等持续不

断，层出不穷。这种文化热迄今未曾衰歇。

在这个时期里，文化史著作大量产生，种类繁多。从其针对的对象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带有普及和介绍性的参考书和知识性读物；一种是具备基础文化知识介绍的内容，但更具有相当学术水准的著作，一般针对较具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如大学生；一种则主要体现为纯学术性的著作、论文，针对的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从其涵盖面来讲，有通史性、系统性而涉及面较广的著作，也有断代文化史、区域文化史、专题文化史、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方面面的著作。此外，文化史工具书和辞典类著作也出版了很多种，文化史丛书也在此时期大量编纂。不定期的文化史辑刊更显示出文化研究的热潮。除祖国大陆外，港澳台地区乃至国外汉学界也出现了众多的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著作^①，而且越来越受到当今学者的重视。

从出版的著作来看，知识性读物如王力、谭其骧、任继愈、启功、杨伯峻等十几位专家学者的讲稿《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中华书局《古代文化专题史话》就相当知名。通史性文化史著作中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编著的《中华文化史》上下2册，共分上中下3编，90万字，史论结合的文化史著作；谭家健主编的《中国文化史概要》，中国台湾地区曾于1989年翻印出版，祖国大陆也修订再版；阴法鲁、许树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1、2、3册，共31章，110万字，是目前同类著作中叙述相对详细的一种；刘蕙荪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稿》以时代为序，分为8章，分论先秦至明清各个时期的文化形态，涉及面比较广泛。断代文化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则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万绳南《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姚瀛艇《宋代文化史》、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等著作。至于儒家、道家、佛教乃至更为细致的如酒文化、茶文化等各式各样的专题文化研究的文化著作更是数不胜数，其中也不乏精品之作。

在区域文化研究上有关于楚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东北地区文化、巴蜀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丝绸之路、徽州文化以及长江流域文明等多地区文化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史的则有马学良等编辑的《彝族文化史》、张公瑾《傣族文化》、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等。

^① 关于国外汉学研究著作，可参考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中外文化交流史一向是相对特殊并受到相当重视的一类文化史研究领域。这方面的著作在近20年来，涌现出一批相当有水平的论著。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史》、沈福伟《中国与非洲》、季羨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及《中印文化交流史》、董丛林《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陈高华《海上丝绸之路》、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等等。世界知识出版社于2002年又隆重推出了由李嘉所主编、陈尚胜等著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5卷，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沿革。

在丛书方面，中华书局《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文史知识文库》介绍出版了多种文化史著作，对文化知识的普及与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上海人民出版社从1985年开始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其中不少著作如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万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等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其他如《国学丛书》、《民国学术精典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精典》等都有相当的影响。

在辞典、工具书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文化史三百题》、书目文献出版社《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辞典》等都是非常适用而有相当参考价值的普及性工具书。

此外，不定期文化研究辑刊也是“中国文化热”中的亮点。如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研究辑刊》、三联书店《文化：中国与世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以及四川大学古籍所主编的《宋代文化研究》都是颇有影响的文化辑刊。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化及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文化的价值正在得到更深入的认识与认可。在传统文化热的浪潮中，我们期待着更新更亮的文化史著作，为此也不懈地在奉献着自己的微薄之力。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虽然曲径可以通幽，但我们总是在力图提供一条平坦大道，让后继者、探访者有路可寻，而文化的精蕴正在这条大道的枝丫上无限延伸。本书无疑就是为此而作的一点努力。当我们顺着这条道路走进中国文化的大门时，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研究和简要再现开辟荆棘，做出过不懈努力的人们！

李 健 金生杨

2003年6月于西华师范大学